

论大众传媒与党的执政民主

杜 刚

摘 要：党的执政民主的过程，就是一个执政党与公众、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舆论的双向互动过程。而大众传媒作为彼此联系沟通的纽带，一头肩负着执政党的价值与主张，另一头牵动着公众的意见与诉求，成为影响党的执政的重要现实力量。

关键词：大众传媒；执政；公共参与；网络问政

作者简介：杜刚，男，副教授，法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7) 05-0019-08

在现代民主国家，党的执政越来越具有“权力—权利”互动的色彩，不仅要体现“权力的声音”，还必须尽可能反映和整合好“权利的诉求”。^[1]而大众传媒在执政党与公众的互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断强化着“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和彼此间的信息舆论对话，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由统治到治理、由单向性到互动性的转变。现代大众传媒所构建的执政党与公众、政府与社会间信息舆论互动平台，极大地促进了党的决策民主化，扩大了公众政治参与，方便了彼此的政治沟通对话。

一、大众传媒促进决策民主化

公共决策是执政党的重要功能，也是政党执政的中心任务，而采取何种决策方式对于维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至关重要。决策民主化指在决策过程中深入了解民情，顺应民心民愿，集中民智民力，遵循民主程序。^①民情、民意、民智、民力是民主决策的四大基石。^②决策的民主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

（一）传媒促进权力运行多元化

现代传媒日益渗透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促进了话语权的扁平化和公众话语权的回归。除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等所拥有的正式的公共决策权外，公众权利和媒介权力等非正式的公共决策权也日益活跃于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中，并贯穿于公共管理全过程、各环节的始终。^③以往作为公共管理客体的公众个体、公共媒介及其他社会组织也获得了权力资源，并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引发公共议题，影响公共决策进程。在话语权扁平化和权力运行多元化的今天，传统科层制下的权力一元垂直结构将不复存在，权力结构越来越呈现多中心横向发散的特点。公共决策权不再专属于政党和政府，公众个体、社会组织借助网络等现代传媒参与权利伸张、意见表达、话题讨论和舆论施压，也同样获得权力资源。尽管这些社会权力资源只是一种软性权力，且大多以草根“权利”的形式呈现，但足以引起政府正式决策权的重视和利用。在当今网络时代，网络民意集中代表了公众权利或社会组织权利，通过对媒介权力的灵活运用，已崛起成为公共决策中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其背后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与对话^④，既对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宝贵的社会舆论资

① 奚洁人：《科学发展观百科全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林竹：《民情、民力、民智和民意——国家决策的四大基石》，2004年第4期《天津社会科学》。

③ 陶学荣：《公共行政管理学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张淑华：《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权利与权力的对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源与信息资源,也对公共决策权形成强大的监督和制约。网络草根权利、社会组织权利和传媒软力量的介入,致使权力运行日益多元化。在人人皆有“麦克风”的时代,大众传媒构建的新闻信息场与公众民间舆论场彼此融合,不断强化着与官方舆论场的互动和对话,并日益显示出民间舆论的强大威力和草根意见的强烈诉求。某些政府部门再也不能关起门来决策,无视民众的权利主张。正如林肯所言,“如果我们站在公众舆论一边,则无往而不胜;相反,将一事无成”。^[2]现代传媒环境和公众舆论环境无疑对某些政府部门的传统封闭型、家长制决策方式提出严峻挑战。当然,在一个“大嘴小嘴都说话”的网络民主时代,公共决策权的多元化,公众话语权和表达权的泛化,亦会催生非理性的意见表达和过激的权利诉求。

(二) 政党传统的利益综合功能式微

一个政党要维护其执政秩序、巩固其执政地位、实现其执政目标,在进行公共管理与公共决策时,除了首先代表本阶级、阶层的利益,还必须尽可能反映和整合其他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正如李普塞特所言,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中,政党既是社会冲突的力量,同时也是社会联合的力量,“一方面,每个政党都建立了跨地区的沟通网络,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民族联合;另一方面,正是它的竞争性帮助建立了超越任何小团体和帮派之上的全国性政府体系。”^[3]政党为实现执政目标而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整合不同群体利益的行为,便是政党利益综合功能的具体体现。随着网络民间力量的崛起和网络舆论话语权的活跃,政党作为联系国家与社会的传统纽带的功能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大众传媒无与伦比的社会穿透力,为公民主动参与公共管理提供便利。公众的利益诉求不仅限于在传统政治系统内各科层间自下而上的表达,完全可以直接诉诸于大众传媒,通过网络公开表达,引发公共讨论和舆论关注,引起最高决策层的注意。当前,“上访不如上网”在公众中的流行,预示着网络已成为公众权利诉求与公民政治参与的热门选择。习近平同志曾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就要到哪儿去。”^①更多地诉诸于网络民意,通过大众传媒直接倾听百姓呼声,已成为公共决策的一种现实需要。现代政党在决策中对于大众传媒手段,对于网络社会舆论的倚重,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社会利益综合角色的日益泛化和“自上而下”传统决策方式在功能上的弱化。网络舆论多元化,公民利益表达的多样化,增加了执政党、政府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难度,特别是对执政党在纷繁复杂的传媒政治诉求环境中整合各方利益、做出科学决策提出了严峻挑战。

在当今网络时代,政党和政府不能固守传统的组织沟通体系,仅仅依赖于其所构建的跨地区的沟通网络或通过其所建立的全国性政府体系来应对和整合日益多元复杂的社会利益诉求。面对传统组织沟通体系利益综合功能的式微,党和政府要主动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深入网络社会,了解网络民生,增强网络协商对话本领,驾驭网络新媒体工具,提升在复杂利益博弈格局下的利益综合能力。

(三) 传媒成为民主决策的重要平台

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指出:“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②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成败取决于民意的支持。有些地方党委政府为了政策的执行效率和所谓的政绩,往往置百姓的利益于不顾,也不管实施效果好不好。政策走向了民意的反面,作为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公共决策部门,在决策过程中就会面临合法性的质疑。现如今,公共政策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公共决策不再是在政治系统内封闭环境中进行的,

① 习近平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 [美] 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阎克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而是在官方与民间互动中开展的，既要体现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施政目标，又要反映民情民意，集中民智民力。从政策制定的程序来看，决策往往需要有经历从下到上，又由上至下的几个回合，政策的制定出台需要经过民意调查、专家咨询、决策论证、民意讨论、公众听证、社会公示、效果反馈等环节。大众传媒作为党委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且本身作为信息、舆论传播的工具和手段，在党和政府民主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决策前，利用大众媒体广泛收集社会舆情信息，采取新闻调查、采访访谈、网络问政等方式，及时准确地了解民生信息、民众意见，掌握公众的政治诉求。决策部门对大众传媒收集的民意诉求和传媒反映的舆论信息进行梳理汇总，确定阶段性工作要点和政策举措，并交由相关部门开展调研、专家咨询、决策论证，拟定相关政策。随后，通过主流传媒设置新闻议程，开展网络民意调查和网络公共讨论，检验政策的群众认同度，广泛征求社会意见，修订和完善政策方案，并引导社会舆论。在政策颁布实施前，召开听证会（包括网上听证）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权衡政策利弊，并最终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向社会发布政策信息。在政策制定实施全过程中，大众传媒重要平台对于促进决策民主化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大众传媒与公众政治参与权的实现

决策的民主化体现为执政党、政府公共政策的社会面向，而公众政治参与则是公众在政治实践中，随着自身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觉醒，主动利用包括现代传媒在内的所有渠道和途径参与政治生活，影响公共政策与政治进程，实现自身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一）政治社会化与公众政治参与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立场的过程。它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4]政治社会化的传统媒介除了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工作单位之外，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成为现代社会公众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传播学者张昆认为，政治系统与大众媒介系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公众的政治社会化。^[5]政治社会化既是执政党、政府将主流政治信息、政治文化向公众输出和传播的过程，也是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并同政治系统进行互动的过程，这两个过程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系统的介入。而以往的政治社会化是以执政党为主的单方面的政治信息、政治文化的传播行为，在大众传媒的使用上主要依靠广播、报刊、图书等传播媒介。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公众与政治系统相互影响、彼此互动深刻而广泛，政治社会化过程主要依靠互动性、交互性更强的网络传媒来实现的，更多地体现为公众主动的媒介政治参与。

因此，政治社会化作为执政党的一项重要功能，不仅体现在执政党单方面的政治传播过程中，而且内在需要公众政治参与来完成，并且表现在网络民主政治的全过程中。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①政治参与作为普通公民政治实践的主要形式，是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实现方式，是公众个体外化政治文化和成为政治人的过程。^②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公众主动的政治参与就没有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和公民政治参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执政党与公众、政治系统与公众的互动过程，彼此的互动日益离不开大众媒介系统。网络传媒的使用，使政治系统塑造公众的同时，公众也在影响政治系统；而公众参与政治系统时，自身也深受政治价值观念的影响，实现了政治社会化。网络传媒时代，执政

①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 王秀娟：《政治社会化与政治参与》，2004年第1期《理论探索》。

党政治社会化行为与公众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两种力量交汇于互联网交互传播平台。网络传媒时代的官方政治信息、政治文化的传播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与公众主动的网络政治参与相结合,更显亲民性、互动性和平民化,避免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朋辈教育、组织培训的单向性、灌输性特点,极大地调动了公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公众的政治冷漠,培养了公众的政治热情、政治参与意识和现代公民精神,促进了执政的民主化。

(二) 知情权是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前提

知情权指的是公众拥有不受阻挠地寻求与接受信息的权利。^[6]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是公众参与政治活动,提出政治主张,监督公权行为的重要前提。而在大众传播环境中,公众知情权大多是依靠大众传媒来实现的。大众传媒既是党委政府信息公开、了解公众诉求的主要途径和载体,也是公众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政府新闻发布会的定期举行、党务政务网站、微博的开通,架设了执政党与公众信息交流的桥梁通道。公众知情权的扩大与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是密不可分的,而大众传媒的活动,深刻影响到公众知情权的实现程度。二战结束后,美国新闻编辑者协会曾提出:“您的报纸为您的知情权而战斗!”^[7]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密集报道,使公众能及时获取政治信息与公共信息,了解党委政府做出的决策及决策的进展程度等有价值的信息。但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市场化对公众知情权的侵犯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集中体现在新闻失实、话语霸权、新闻娱乐化等三个方面。^①与此同时,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各种信息良莠不分,各方舆论众声喧哗,互联网领域充斥着多种杂音和噪音。因而,处于新闻失真、媒体失语或众声喧哗环境中的公众,要从中甄选有价值的新闻资讯,了解事件真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某些地方政府也出于对狭隘利益的保护,决策过程中暗箱操作,对重大突发信息隐瞒不报,直接影响了公众对政治信息的了解程度。英国学者约翰·基恩在《媒体与民主》一书中发出深深的疑问:“二十世纪新型国家审查以及跨国媒体的出现、电子媒体的增长是否毁坏了现代理想?”^[8]尽管约翰·基恩所指的“现代理想”是西方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和国家审查,争取“共和民主”与“出版自由”的理想,但仅就西方真正的新闻自由和民主理想并不存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现代传媒环境对于公众的知情权的帮助与戕害是并存的。大众传媒对于公众政治参与权的促进和制掣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关键在于营造良好的媒体环境、公众舆论环境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环境。而作为重要信息源和公共信息管理主体的党委和政府,确保公众能制度化地了解政务和决策信息,保证党务政务信息、公共信息的足够公开和透明,对于扩大公众政治参与权来说尤其珍贵。可见,确保公众知情权,一方面要构建健康的传媒舆论、信息传播环境,避免新闻失真、媒体失语和公众舆论的众声喧哗;另一方面,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建立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公开的快速反应机制,从制度和机制上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三) 传媒接近权是公众参与权的重要体现

美国学者J·A·巴隆在1967年首次提出传媒接近权(The right of access to mass media)的概念。传媒接近权指的是社会公众通过大众传媒阐述观点、表达主张、发表意见和参与各类公共活动的权利,同时,传媒接近权也赋予传媒向公众开放的责任与义务。^[9]传媒接近权是现代传媒时代公众表达权的新体现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只有充分保障公众对媒介的接近权,才能提升公众的话语权。大众传媒作为公众表达政治观点和态度的重要渠道,对于公众表达权的实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作为社会的信息媒介和舆论机关,传媒的每一次进步,都对人民与政府间的对话产生深刻影响。随着大众传媒从纸质形态发展到电子形态,从传统媒体发展到数字新媒体,公众

① 周源源:《大众传媒下的公众知情权问题探析》,河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政治参与权、表达权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和延伸。在人人皆有“麦克风”的网络传媒时代，大众传媒与公众的日趋结合，客观上为公众的传媒接近权、草根话语权和政治参与权的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通过向公众提供机会均等的利用媒介机会，使得公众的政治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引起政治决策层的关注。而且，公众诉诸网络传媒，能越过传统政治表达的诸多中间层级，使得意见和诉求瞬间直达最高决策层，从而确保了草根政治参与的高效性和政治决策的科学性，推动了现代执政党、政府的执政理念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公众传媒接近权的实现与扩大，大大激发了公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唤醒了公众的权利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客观上起到了调节社会舆论、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10]民主政治时代，公众的传媒接近权显得十分必要而珍贵。当前，随着网络新型传媒的广泛运用，公众的传媒接近权、参与自由权得到了充分体现，公众在利用网络等大众传媒参与协商民主、监督公权运行的过程中的建设性作用日趋凸显。大众传媒作为公民利益表达和民主协商的重要空间，应当积极发挥“公众论坛”的功能，摒弃狭隘的媒体利益，调动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积极性。和谐社会作为能包容各种不同声音和主张的社会系统，需要党委和政府部门营造一个更加自由、开放、客观、公正的新闻传播环境。在我国，真正调动好、利用好、保障好公众的传媒接近权，还会面临很多现实困境。这不仅表现在，某些地方党委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胸怀上，也体现在媒体的自身建设上。

（四）网络政治参与与网络问政

网络政治参与是指公众以网络为媒介参与政治生活，从而影响公共事务和政府公共政策的行为。^①网络作为连接党委政府与公众的桥梁，大大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门槛，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效率，使得公众“有困难，找媒体”成为一种常态。网络传媒最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也最能体现公众的传媒接近权和话语权。网络所具有的超强社会聚合功能，改变了政治活动单纯是“党委政府做、百姓听”的传统模式，为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的聚集、组织和动员提供了便利，大大克服了传统信息、舆论传播模式中公民政治参与、民意表达在范围和程度上的局限性。透过网络空间，公众可以及时了解党委政府在进行何种决策以及决策的进展情况，从根本上打破了信息的不对称状况，激发了公众的表达欲和舆论的关注度。网络时代使“决策者边说边听，百姓边听边说”成为一种可能，公众政治参与再也不是遥不可及或与己无关的事情。^[11]近年来，围观式政治参与越来越成为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新形式。网络围观式政治参与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参与，亦不属于普通的“看客现象”，其效应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沉默的螺旋”，它是一种以网络为中介的“话语参政”，并以集体政治行动为活动方式。^②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网络政治的兴起和网络公众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为执政党、政府通过网络与公众互动提出了迫切要求，促进了党委政府主动面向网络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深刻改变了党的执政方式。网络问政推进了党委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促进了党和政府管理理念、政治思维方式的与时俱进，深刻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决策方式、政策发布方式。领导干部主动“触网”，顺应网络民意，倾听网民呼声，是网络传媒时代执政的基本素养。

网络问政与网络政治参与反映了执政党与公众、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矛盾统一。“网络围观”式政治参与作为网络时代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不可避免的负作用，如伴随网络围观出现的话语暴力、网络审判、人肉搜索，以及“网云亦云”、“以讹传讹”等极端现象。这些现象严重时甚至会攻击党的执政秩序，破坏网络民主环境，威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① 王金水：《网络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政治稳定研究》，2012年第5期《江海学刊》。

② 陆斗细等：《围观式政治参与：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2013年第2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对党执政带来种种不利影响。为此,应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政治参与的正面效应,消除不利影响。坚持网络问政与公众有序政治参与相结合,既要顺应网络政治新形势,呼应百姓新诉求,又要维护稳定的执政秩序和清朗的网络舆论空间,在和谐稳定的执政环境中促进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党的执政民主化,实现党委政府、大众传媒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三、大众传媒成为政治沟通的重要通道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打破思想僵化和利益隔阂的藩篱,增进各方的理解和支持,必须充分发挥传媒政治沟通的作用,增进执政党与公众、政府与社会的信息及舆论传播与沟通,保持政治系统的开放性、执政的民主化与亲民性。

(一) 政治沟通对大众传媒的依赖

政治沟通即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12]从政治与社会关系来看,政治沟通不仅是政治系统对公众的信息传播,同样也包含了全社会范围内通过不同方式对政治施加影响的过程,体现在政治民主化的全过程中。政治沟通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命题,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指的是政治系统进行输入—输出的工具。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伊斯顿、阿尔蒙德、多伊奇将系统论、控制论理论运用于政治系统,以系统论、控制论来分析解释政治现象。多伊奇认为,科学的决策是政治活动的中心,通过科学的决策和控制实现政治系统对社会的有效统治和管理,而科学的决策和控制是以政治系统内相关机制对信息的接收、选择、存储、分析和处理为前提的。^[13]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一书的问世,标志着系统的政治沟通理论的形成。政治沟通的另一种含义指的是政治传播,可以理解为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开展的政治信息、政治思想及态度的传播和流通过程。学者谢岳认为,政治沟通是指政治信息依靠某种通道而进行的交换和传递过程,他从政治传播的分析路径总结了政治沟通的五条通道:选举制度、会议制度、文件制度、大众传媒和信访制度。^[14]学者郁建兴从政治交往意义上阐述政治沟通,认为政治沟通实际上是政府与公众基于公共性和相互理解的彼此协商对话。^①无论是作为政治系统输入—输出工具的政治沟通还是政治传播意义上的政治沟通,抑或是政治交往语境下的政治沟通,都可以理解为政治信息在政治结构及程序中的传递与交流,都离不开大众传媒桥梁纽带作用的发挥。大众媒介成为现代国家政治决策与政治沟通的基本工具。

现代大众传媒既能及时有效地反映党的意志,又能真切地传递民众的心声,依托大众传媒开展的政治沟通能卓有成效地推动执政的民主化、科学化与亲民性,改变传统体制内官民、政民沟通中的不畅通、效率低、易走样等种种弊端,起到其他组织、机构或制度性政治沟通无法取代的作用。

(二) 传媒政治沟通在党执政中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执政民主化程度的高低、政治生活运行的健全与否、决策水平的高下,直接与政治沟通机制的健全度、沟通能力的强弱度相关联,政治沟通直接关系到党执政的好坏和社会的安定团结。^②而传媒政治沟通在党的执政中更加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促进政治系统良性运行

政治系统不能在自身封闭的环境中运行,必须时刻与周围环境发生信息的交流与互动,而政治沟通作为政治的神经系统,是政治系统赖以运行的关键。政治学者王浦劬认为,输入、调节、决策、执

① 郁建兴等:《政治交往:一种政治沟通的新分析路径》,2009年第4期《社会科学辑刊》。

② 俞可平:《政治沟通与民主政治建设》,1998年第2期《社会主义研究》。

行和反馈构成了中国政治系统的核心环节，而要求政治系统的存续，就要求政治系统的内在机制发挥对输入的压力和反馈的压力的调节作用，以适应环境要求，调整政策方向。^① 政治系统的内在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治传播与政治沟通机制。作为政治生活基本要素的执政党（政府）与公众是政治沟通的主体。执政党与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对于执政党保持对社会的有效控制、推进政治社会化、巩固执政合法性，对于培养公众的政治认同、消除政治隔阂、维持政治系统的存续，对于促进彼此间的政治信息流通、降低政治系统风险、保持政治系统的结构平衡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执政党与公众之间沟通渠道不畅，沟通机制不健全则会弱化执政党对于社会的利益整合，加剧社会分化、对立，严重影响到政治系统的稳定和良性运行。

过去，执政党的政治沟通主要依赖于科层制，通过选举、会议、文件、信访等制度形式开展单向度的政治沟通；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与公众互动性不强，信息的对流量不足，信息传播失真、走样较为明显，政治决策缺乏民意基础，公众对政治运行知之甚少。而网络等现代传媒构建了公众与执政党、政府间直接的对话关系，越过了政治系统科层制中过多的中间环节，减少了民意在传递过程中的信息失真，增加了政治系统信息输入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广泛性，维持政治系统“输入”、“输出”的相对平衡，确保政治系统在“输入”与“输出”相互转换中的良性循环，^② 促进了政治系统良性运行。

2. 疏导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使得社会利益分化加剧。党和政府的政治决策总是力求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难免会使有些群体获益多，有些群体获益少，招致部分群众的不解和不满。在传统的政治沟通体制下，执政党和政府自身存在着沟通动力不足、沟通渠道不畅、沟通信息失真、信息传递噪声多、敏感度低等方面的问题。^③ 政治系统输出与反馈总是不能全面满足公众需求，彻底舒缓公众焦虑的心理，处理不好，还会引发公众的“网络审判”与对抗性监督。而网络政治沟通使得执政党、政府与公众之间能进行适时性、交互性的交流和反馈，既能广泛地了解公众多样化利益诉求，又能根据公众需求的改变，适时调整政策走向。执政党和政府通过党务政务信息网上公开、微博问政、网络社区参与等方式建立与公众的直接沟通，大大地缩小了彼此间的信息鸿沟，促进了执政党与公众的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有利于执政党化解利益矛盾，调解利益冲突，更加有效地整合社会多元利益格局。在危机事件中或矛盾激化时，面对公众网络围观式政治参与，执政党应主动通过网络、电视等大众传媒开展与公众的互动和沟通，主动向公众公开事件真实信息和事件处置的进展情况，甚至向公众公开个人财产等敏感信息，消除公众疑虑。同时，要发挥社会舆论的正能量，积极吸纳民间智慧，调动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到危机事件的处置中来。唯有如此，在危机事件、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才不致使官民关系陷入所谓的“查水表”与“查手表”^④ 的极端化、情绪化对抗中来。

3.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新形势下，党员队伍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和蔓延，既侵蚀了党的健康肌体，助长了贪污腐败，而且还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的

① 王浦劬：《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基本特点刍议》，2010年第8期《科学决策》。

②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③ 俞可平：《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1988年第3期《政治学研究》。

④ “查水表”是指个别官员在突发事件中处置不力、态度蛮横及“官老爷”习气，引发公众不满而掀起的对抗性监督，网民披露官员露面时所佩戴名表、饰品等，引发全民网络审判。“查水表”比喻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对于有些网民的网络言行的干预和威胁。

执政的合法性根基。而在当今网络传媒时代,走进网络就是深入群众,懂网络、会网络不仅是一般行政干部信息化办公的要求,也是党群沟通、干群沟通的新渠道。古人云:“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党员干部抛开诸多繁文缛节和层层汇报,直接深入网络,与网民“零距离”接触,关注网络民生,掌握网络舆情,了解网民诉求,获取第一手资料,可以弥补常规性沟通在机制和渠道上的不足,为正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而且,党员领导干部深入网络,与广大网民接触,拥有自己的粉丝群,其本身就是转变作风、务实亲民、提升执政公信力的生动体现。对于从感情上贴近网民,从思想上尊重网民,从工作上解决网民实际困难,从根本上改善党群、干群关系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党和政府应充分利用网络现代传媒,建立官方与民间沟通对话的常态化机制,实现官方话语与草根话语的良性互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参考文献:

- [1] 高波. 政府传播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 45.
- [2] 谢岳. 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25.
- [3] [美]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一致与冲突 [M]. 张华青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137.
- [4] 杨光斌. 政治学导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87.
- [5] 张昆. 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45.
- [6] 林喆. 知情权: 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 [N]. 学习时报, 2004-09-13.
- [7] 刘杰. 知情权与信息公开法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45.
- [8] [英] 约翰·基恩. 媒体与民主 [M]. 刘士军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
- [9]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179.
- [10] 郑保卫. 新闻理论教程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302.
- [11] 刘学松. 网络政治参与对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EB/OL].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7/9904608.html>, 2009-08-21.
- [12] [英] 戴维·米勒, 韦农·波格丹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M]. 邓正来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547.
- [13] Deutsch·K·W.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77.
- [14] 谢岳. 当代中国政治沟通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3-14.
- [15] [美] 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M]. 王浦劬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479.

[责任编辑: 高辛凡]